



#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工作论文系列

Working Paper Series

## 保障性住房、社会身份与公平感

——来自社区实地实验的证据

罗俊 黄佳琦 刘靖姗 石荣浩

ETBMWP2022054

2022. 10. 19

\* 本刊编辑部推出工作论文项目，将“拟用稿”而尚未发表的稿件，以工作论文的方式在官网呈现，旨在及时传播学术成果，传递学术动态。

本刊所展示的工作论文，与正式刊发版可能会存在差异。如若工作论文被发现存在问题，则仍有被退稿的可能。各位读者如有任何问题，请及时联系本刊编辑部，期待与您共同努力、改进完善。

联系人：李老師；联系电话：010-62515330

# 保障性住房、社会身份与公平感<sup>\*</sup>

——来自社区实地实验的证据

罗俊 黄佳琦 刘靖姗 石荣浩

**[摘要]**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指出要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的同时,明确提出要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长期租购权利的不平等容易使得人们在心理认知上给予租房与购房不同的价值权重,这种认知上的差异进一步造成了租、购两类住户社会身份上的差异。因此,探究租购身份差异是否会影响人们日常交往时的公平感对于改善人民居住条件,避免租购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分割,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重要意义。为控制其他因素的干扰,我们运用实地实验方法,以同一社区的经济适用房住户和公租房住户为实验对象,以是否公开租购身份信息为干预手段,将租购身份外生地引入最后通牒博弈中,从自我认知和对他人的认知两个角度考察租购身份是否会影响租、购住户之间的公平分配行为。结果显示公开租购身份会唤醒租房者的自我认知,长期的租购权利不平等使得租房者渴望更公平的资源分配。同时公开租购身份也会改变人们对他人的认知,相比于面对购房者,人们在面对租房者时会提出更加公平的分配方案。

**[关键词]** 保障性住房; 租购同权; 社会身份; 最后通牒博弈; 实地实验

##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强调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以共享为根本目的,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优质化水平,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住房体系实现了由实物分配到商品化的转变。同时,为使全体民众共享住房商品化的改革成果,我国建立了以经济适用房

为主体的保障性住房体系来满足那些买不起房、租不起房的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2007年国务院下发《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不再将经济适用房作为城镇保障性住房的主体,而将其定位为政策性住房,其购买者将拥有住房的产权。同年,公租房开始在深圳试点实施,随后北京、厦门、重庆等地也纷纷出台关于公租房建设的方案并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逐步形成了以公租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在2015年的人口抽样调查中,西藏、宁夏和北京居民住房来源为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廉租房和公租房的家庭比例分别为15.12%、13.72%和

<sup>\*</sup> 罗俊、黄佳琦(通讯作者)、刘靖姗、石荣浩,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邮政编码:310018,电子信箱:luojun@zufe.edu.cn。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073117);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2021C25041)的资助。我们感谢翁浩博、杨若虹等人在实验过程中所提供的帮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 罗俊等：保障性住房、社会身份与公平感

12.31%，说明保障性住房已成为居民住房的重要来源。2008年至2018年，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约7000万套，其中经济适用房573万套，限价房282万套，公租房（含廉租房）1612万套以及棚改安置住房4522万套。广泛建设的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缓解了城镇住房矛盾，稳定了城镇房屋市场的供求平衡。截至2018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已帮助3700多万住房困难群众住进了公租房，更有5000多万买不起商品房却又有一定支付能力的群众通过购买经济适用房改善了居住条件。

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在实现住房保障（陈超等，2011）、解决流动人口安家问题（李勇辉等，2019）的同时，还使城市布局更加合理规范（周素红等，2010）。但由于租购属性的不同，保障性住房内部既包含出售的经济适用房也包含出租的公租房。在当前租购权利不同的公共服务制度下，租房者与购房者在户籍、教育、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权利享受上仍有着一定差异，比如在教育方面，拥有房屋自有产权的家庭拥有就近安排子女入学的权利，而租住的家庭只能依靠“积分入学”<sup>①</sup>等政策申请入学。

除此之外还有基本政府服务、基本养老、医疗健康等基本公共服务权利的差异。这些日常生活中不平等的待遇可能会使人们在观念上认为购房者和租房者代表的是两类不同的社会身份，其中租房者是遭受到更多不公平待遇的群体。一旦这种观念形成，会使得租、购住户在日常的资源分配活动中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厌恶偏好（Fehr and Schmidt, 1999），影响公平分配结果。而社会身份作为一种信息集，涵盖了人们对过往经历的总结和归纳，可以作为外显人们心理认知的工具。因此由权利不同引致的社会身份差异是否会影响公平感及其影响机制值得我们展开深入的探究。

本文以保障性住房内部租房者与购房者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视角上考察租购不同社会身份的形成对于人们相互交往过程中公平感的影响，为实现租购同权、缓解社会分割、促进共同富裕提供实证支

持。对这一机理的检验，也可以帮助我们从小微观层面验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中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意义所在。

鉴于公平感在现实生活中难以量化，我们运用实地实验方法，在浙江省宁波市招募了经济适用房住户和公租房住户开展社区实地实验，将是否公开租购身份作为干预手段，考察租购身份对人们相互交往过程中公平感的影响。以实验方法代替传统计量方法还可以避免由于社会身份、个体特征和行为表现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我们选择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Güth et al., 1982）来考察人们的公平分配行为。在理性人假设下，该博弈的均衡解为提议者（proposer）提出一个尽可能小的分配额，响应者（responder）会接受任何非0的分配额。然而，大量实验结果表明人们更加倾向于公平分配，而非遵循完全理性人的假设。Oosterbeek et al.（2004）对37篇论文中涉及的75个最后通牒博弈结果进行汇总，发现提议者平均分配40%的初始禀赋给响应者，而响应者的平均拒绝率为16%。已有研究还表明，这种公平分配行为受到博弈双方种族、性别、宗教、政治等社会身份（Fershtman and Gneezy, 2001；Henrich, 2000；Solnick, 2000；Benjamin et al., 2016）的影响。

为了排除家庭收入、生活环境、地理位置等其他因素的干扰，检验租购身份本身的差异对人们公平分配行为的影响，我们以生活在同一社区中的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住户和公租房）住户为实验被试。这些住户都属于当地的低收入群体。我们通过是否公开博弈对象的租购身份来干预被试对博弈对象租购身份的认知，以研究在面对不同租购身份的博弈对象时，提议者或响应者的公平决策是否不同，从而考察这种身份认知是否会改变他们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行为决策。

实验结果表明，人们对于租购身份的差异有明确的认知，这种认知进而影响了他们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表现。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公开租购身份会

<sup>①</sup> “积分入学”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教育领域的尝试，指以积分排名的方式安排外籍常住家庭子女入读公立学校的政策，各地的积分获取方式各有不同。

显著提高人们对公租房住户的分配额；在公开租购身份后，相比于面对公租房住户，经济适用房住户在面对经济适用房住户时表现得更加不公平且更易接收其不公平的分配。

在此基础上，我们借助“差异厌恶”模型 (Fehr and Schmidt, 1999)，通过构建差异厌恶参数量化了博弈双方的优势不平等厌恶水平和劣势不平等厌恶水平<sup>①</sup>，对租购身份影响公平感的机制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在对参数进行细致的分析后，我们观察到在租购身份信息公开时，两类住户差异厌恶偏好存在不同。公租房住户在日常生活中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权利更少，因此当作为响应者时，他们的劣势不平等厌恶水平强于经济适用房住户，从而表现出更强的公平感，要求更公平的分配方案；而人们在作为提议者时，相比于面对经济适用房住户，在面对公租房住户时会表现出更强的公平感，提出更加公平的分配方案以表达对弱势群体的善意。

本文余下部分按以下结构展开：第二部分为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梳理了本文的研究方法、文献支持，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实验设计，介绍了模型的设定、被试的选择、实验局的设置以及实验的开展过程；第四部为实验结果，报告了实验的结果并给出非参数检验和计量回归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总结此次实验得出的结论，并讨论其意义和不足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

社会隔离对于社会阶层固化、社会分裂、贫富差距加大的形成有极大的刺激作用 (Cutler and Glaeser, 1997)。对于欧美国家而言，他们更多关注由收入高低、种族差异 (Chetty et al., 2020) 等因素产生的社会隔离问题；而对于中国——经历了长期演化融合的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差异具有

内生性，是长期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不同于国外，我们应当更多关注城市多元差异群体，诸如户籍与非户籍、高学历与低学历、高收入与低收入等群体之间产生的社会隔离问题。

自我国尝试商品化住房以来，租房者与购房者之间形成了收入、社会地位、公共服务权利等方面的差异，并可能进一步在两类住户之间产生社会分异 (social segregation)<sup>②</sup>。在考察由社会分异所产生的居住隔离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问题时，已有文献大多采用宏观数据分析 (黄友琴和易成栋, 2009; Chetty et al., 2020 等)。此类分析可以准确的识别出群体在空间上的分异隔离，比如黄友琴和易成栋 (2009) 采用 2000 年的人口普查 0.1% 按户抽样调查数据，通过计算武汉市的居住分异指数 (dissimilarity index) 和孤立指数 (isolation index)，发现武汉市各分区的居住隔离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但若要在微观视角上对社会分异的成因及影响进行因果分析，则需要借助其他研究工具。鉴于本文的研究是基于社会身份视角的微观数据分析，因此我们采用实地实验方法，将租购身份外生地引入个体博弈实验中，以探究租购身份对个体公平感的影响。另一方面，关于保障性住房所带来的社会公平问题大多是从宏观层面出发，如考虑完善准入和退出机制 (吴莹和陈俊华, 2013)、改进公租房匹配机制 (邓红平和罗俊, 2016) 等。极少有学者从微观层面，分析现行保障性政策下可能形成的社会身份对租购两类人群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公平感的影响，从而论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意义。

社会身份是个体自我意识的一部分，源于对社会群体的认同感 (Akerlof and Kranton, 2000)，社会群体或个人会因为分属于不同的群体而形成不同的社会身份 (Tajfel, 1974)。由于在子女入学、社会保障、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权利上的差别，购

<sup>①</sup> “优势不平等厌恶”意为，在收益分配不平等时，处于收益优势的个体有动机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他人而缩小双方的收益差距；而“劣势不平等厌恶”意为，在收益分配不平等时，处于收益劣势的个体有动机通过减少他人利益的行为来缩小双方的收益差距。

<sup>②</sup> “社会分异”指各个阶层、种族、职业群体之间在社会交往中出现的相互排斥、割裂的现象。

房者和租房者可能会成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不同的社会身份会进一步从多个维度影响个体的行为决策。

首先，自身社会身份认知的唤醒会对个体自身的表现产生影响。当个体社会身份信息被公开揭示时，由于刻板印象的存在，可能会对个体自身意识产生影响（Hoff et al.，2006）。若唤醒该身份会增加他的消极意识，则会导致其表现更差；若唤醒该身份会增加他的积极意识，则会使其表现的更好。学者们采用心理学的“启动”（priming）技术（Bargh，2006），唤起被试对其所属身份的心理认知，通过比较“启动”前后个体的行为差异来研究社会身份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Benjamin et al.（2010）通过“启动”被试的宗教身份、种族身份和性别身份，研究身份对个体时间偏好和风险偏好的影响。Cohn et al.（2015）也用此方法研究了罪犯的犯罪身份如何影响他们的违规行为。他们要求罪犯报告“抛硬币”游戏的结果，发现相比于对照组，“启动”组的罪犯谎报游戏结果以获取收益的可能性更大。Berge et al.（2015）在肯尼亚开展了关于种族认同的研究，但在“启动”前后均未发现被试存在种族偏见行为。Hoff and Pandey（2006）在印度乡村开展关于种姓身份的实地实验，发现公开被试的姓氏会显著的降低低等姓氏个体学习的信心，降低低等姓氏与高等姓氏对手竞争的意愿。Afridi et al.（2015）在中国开展了关于户籍身份与激励下个人绩效的实地实验，发现户籍身份的启动会降低外地户籍学生在激励制度下的表现，提高本地户籍学生在激励制度下的表现。Luo et al.（2019）则发现当户籍身份信息被启动激活时，农村户籍的小学生会降低公平分配水平，并且希望从城市户籍的小学生手中得到更多的分配额。还有大量关于性别身份（Shih et al.，1999；Spencer et al.，1999）、种族身份（Shih et al.，1999）、职业（Cohn et al.，2014）、政治身份（Chang et al.，2014）、宗教身份（Benjamin et al.，2016；Shariff and Norenzayan，2007）的研究也都证明了个体自身身份的唤起会影响其行为表现。

总结上述文献，我们认为租购身份可能从自我

认知角度对人们相互交往时的公平感产生了影响。长期由租购权力不同所带来的不平等待遇，可能已然对租、购住房群体产生了心理认知上的影响。在租购身份被公开揭示时，租、购群体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会因其过往经历的不同而不同。基于此类猜想，我们提出以下两个假设。假设 1：相比于不公开租购身份，公开租购身份会显著改变提议者的分配额；假设 2：相比于不公开租购身份，公开租购身份会显著改变响应者的接受额。

其次，面对不同社会身份的博弈对象时，人们的行为表现也会有所不同。在社会互动交往中，个体在做出决策时会自动地将他人的社会身份视为其决策的影响因素之一（Charness et al.，2007），因此人们在面对与其相同或不同的组群身份的博弈对象时会有不同的表现。如 Chen and Li（2009）按照艺术偏好将被试分为不同的小组，发现人们在面对组内成员时会比面对组外成员时表现出更多的公平、怜悯和合作行为。McLeish and Oxoby（2011）同样发现当人们知晓博弈方与其为同组身份后，会更加倾向合作。Smith（2011）则以随机匹配的方式进行分组，发现被试对于组内成员的信任水平要高于对组外成员的信任水平。Jiang and Xin（2019）在委托代理框架下也发现了委托人在面对组内成员时相比于面对组外成员会提供更加慷慨的收益分享。Bernhard et al.（2006）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展了一场关于部落身份、共享行为和利他性惩罚的实地实验，发现当受害者和惩罚者属于同一族群时，惩罚者会有更高的意愿去惩罚违规行为。

归纳这一脉文献，我们推测租购身份还可能从对他人的信念上影响人们相互交往时的公平感。长期存在的租购权利差异使得人们可能形成了一种认知，认为租房者是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弱势群体，而购房者则是享受更多公共服务的优势群体。当包含这种信息的租购身份被公开揭示时，会强化人们的这种认知，进而影响其在资源分配中的公平感。针对这种猜想，我们提出另外两个假设。假设 3：在公开租购身份的情况下，提议者在面对不同租购身份的响应者时，其分配额不同；假设 4：在公开租购身份的情况下，响应者在面对不同租购身份的提

议者时，其接受额不同。我们的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将基于这四个假设展开。

### 三、实验设计

我们于2020年7月11日至12日，在浙江省宁波市一处保障性住房社区开展了此次实地实验。该社区内有供本地户籍非农业家庭申购的经济适用房、限价房，以及供当地常住人口、住房困难家庭租赁的公租房等。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住户可以将原户籍迁入保障房社区所在街道，享受宁波城镇户籍人口所享有的医疗保障、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权利。除此之外，该住户还可以取得房屋产权，入住满一定期限后可以将房屋上市交易。而租住公租房的住户并不能将原户籍迁入保障房社区所在街道，享受宁波城镇户籍人口所享有的公共服务权利，同时也无法获得房屋的产权。社区有3800多套保障性住房，上万名住户。为了达成实验预期，科学规范地开展实验，我们在被试招募及场地安排、实验设置和实验过程安排上有如下设计和考虑。

#### (一) 被试招募及场地安排

我们选择该社区的住户作为被试群体是因为该社区含公租房住户1020户和经济适用房住户991户，两类住户的比例接近1:1，不存在多数身份或者少数身份的影响(Gautam, 2013)，而且这两类住户并不呈集群分布，没有被刻意的区分，不存在其他组群(Chen and Li, 2009)。

除此之外，该社区的住户均为本地常住居民，在个人特征方面没有太大差。住户的职业也多为技术工人或是待业，都属于中低收入人群，排除了职业和社会阶级对公平感的影响。住户定居在该社区的平均时长为5.5年，几乎在同一时间入住社区，对于租购身份的差异有一定的感受，经历过由于租购身份的差异带来的公共服务权利上的差别。

我们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获得了社区住户

名单。在平衡了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等个体特征因素后，筛选出符合条件的被试名单。我们借助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的工作电话，从名单上随机选择符合条件的住户，招募他们参与实验<sup>①</sup>。根据各实验局所需的人数，我们最终招募到452名符合条件的实验对象，其中经济适用房住户223人，公租房住户229人。

我们选用的实验场地为社区会议厅，该会议厅位于社区便民中心，可同时容纳100人。厅设置有桌椅和多媒体设备，便于我们开展实验。我们将会议厅分为左右两个区域，左边为提议者就坐区，右边为响应者就坐区。我们将座位按顺序编号，以方便实验开始前被试对号入座，并保证每两名被试之间相隔2个座位的距离。每个座位上都放有实验注意事项，以告知实验的匿名性、有偿性和其他相关事项。座位上配有草稿纸和笔，被试所有的决策都写在实验过程中发放的写有实验任务的小卡片上。在实验正式开始之前，实验员需对实验内容进行保密。

#### (二) 实验设置

我们实验的主体为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在该博弈中有提议者和响应者两个角色。提议者将被赋予初始禀赋20元，并选择将其中的 $x$ 元( $x \in [0, 20]$ 且 $x \in Z$ )分配给响应者；响应者需要做出最低接受额(minimum acceptable offer, 以下简称接受额)的决策，最低接受 $y$ 元( $y \in [0, 20]$ 且 $y \in Z$ )的分配额。若 $x \geq y$ ，表示响应者接受该分配方案，双方按照此方案进行分配，提议者获得 $(20-x)$ 元，响应者获得 $x$ 元；反之若 $x < y$ ，则表示响应者拒绝该分配方案，双方均获得0收益。除被试在实验中通过博弈决策获得的实验收益以外，所有被试还可额外得到10元的出场费<sup>②</sup>。实验采取被试间设计(between-subjects design)，每名被试只允许参与一场实验，扮演一个角色，所有被试均在匿名条件下进行博弈决策。

<sup>①</sup> 为了能更好的呈现现实生活中租购身份对人们相互交往过程中公平感的影响，我们招募的被试并不要求一定是户主，也可以是其家庭中的其他成年人，但必须长期居住在社区中。在当地，经济适用房的转租行为被严格禁止，因此不存在住在经济适用房的租客。

<sup>②</sup> 给予出场费是相关实验研究中常用的做法(Chen and Li, 2009; Luo et al., 2019)，可以激励被试参与实验，同时避免被试之间实验收益差距过大。

## 罗俊等：保障性住房、社会身份与公平感

表 1 为实验局设计的具体情况。C1 和 C2 实验局为基准组，被试在做出博弈决策时并不知道与其匹配的博弈对象的租购身份类型。T1、T2、T3 和 T4 实验局为处理组，我们通过在实验说明上描述

与其匹配的博弈对象的租购身份来公开博弈双方的身份，其中在 T1 和 T2 实验局中被试需要面对相同租购身份的博弈对象；而在 T3 和 T4 实验局中，被试则需要面对不同租购身份的博弈对象。

表 1 实验局设计

实验局	实验时间	租购身份	提议者	响应者	提议者人数	响应者人数
C1	7月11日	不公开	经济适用房	经济适用房	36	36
C2	7月11日	不公开	公租房	公租房	35	35
T1	7月11日	公开	经济适用房	经济适用房	36	36
T2	7月12日	公开	公租房	公租房	40	40
T3	7月12日	公开	经济适用房	公租房	38	38
T4	7月12日	公开	公租房	经济适用房	41	41

说明：在实验局 C1 和 C2 中，由于不公开租购身份，改变博弈对象的租购身份并不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只设计了匹配相同租购身份的实验局。

### (三) 实验流程

在每个实验局开始之前，我们都会在门口安排实验员核对被试的基本信息，在核对无误后被试需随机抽取实验编号，然后在对应的座位上落座，阅读实验注意事项，等待实验的开始。当所有被试均到达会议厅后，实验正式开始。

我们的实验包含一个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任务及一份问卷。实验开始时，实验员将分发实验说明并对实验进行详细的解释。待被试充分理解实验流程后，实验员将发放带有实验任务的小卡片。基准组的实验任务卡片上写有在此次博弈中该名被试扮演的角色以及其需要做出的决策；而处理组的实验任务卡片除了有以上信息外还有与之匹配的博弈对象的租购身份信息。被试需根据自己拿到的卡片上的角色做出相应的决策。整个实验过程被试之间禁止相互交流，如果对实验任务有任何问题，只需举手示意，实验员会私下解答他的疑惑。实验员在回答被试的疑惑和举例说明时都采用中性语言，选用同一例子，以防止可能的实验者需求效应 (experimenter demand effect) (Zizzo, 2010)。

在被试完成决策结束后，只需将卡片反置于桌面上防止决策泄露。待所有被试完成决策后，我们

将回收卡片，并由计算机随机匹配博弈对象进行博弈并计算收益。<sup>①</sup> 该过程确保了实验的匿名性，即在决策过程中被试并不知道与之博弈的互动对象是谁，且被试所作的决策也不会被他人知晓。随后实验员将发放一份个人信息调查问卷，该问卷包括了 17 个关于个体特征信息的问题，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入住时间、对公平和邻里关系的看法等。待全部被试完成问卷后，实验员会将报酬发放到被试手中，每名被试的实验报酬都单独置于一个密封不透明的信封内。

## 四、实验结果

我们将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对实验结果的分析。首先，我们对经济适用房住户和公租房住户的个人特征和对待公平的看法、分配额以及接受额进行统计性描述；然后，分别对提议者的分配额和响应者的接受额进行非参数检验和回归分析，考察租购身份对于提议者分配决策和响应者响应决策是否有影响，以及面对不同租购身份的博弈对象时提议者的分配决策和响应者的响应决策是否会有所不同；最后从差异厌恶偏好角度出发，观察租购身份

<sup>①</sup> 我们在实验中采用策略方法 (strategy method) 博弈，即先让响应者对所有可能分配方案做出是否接受决策，再根据随机匹配结果，对应提议者的真实分配方案，来决定最终的博弈结果并计算他们的收益。这种方法既保证了博弈的真实激励作用，又能收集到响应者面对更多分配方案下的决策数据 (Brandts and Charness, 2011)。

对于个体优势不平等厌恶和劣势不平等厌恶的影响，从而推断租购身份对公平感的影响路径。

(一) 样本统计性描述

为了便于在数据分析时控制经济适用房被试和公租房被试之间的个体特征，并获知住户对待公平问题、邻里关系的看法，我们在被试完成博弈决策

后，通过发放调查问卷收集了被试的个体基本特征和关于公平感的看法。我们共计收回 452 份问卷，其中经济适用房住户填写了 223 份，公租房住户填写了 229 份。表 2 为经济适用房住户和公租房住户在个体特征和对待公平问题看法上的比较。

表 2 经济适用房住户与公租房在个体特征和看法上的比较

个人变量	均值		样本大小		双侧 t 检验 p 值
	经济适用房	公租房	经济适用房	公租房	
年龄	59.78 (11.84)	62.63 (12.37)	223	229	0.079*
性别	0.227 (0.42)	0.344 (0.47)	223	229	0.051*
受教育程度	2.85 (1.14)	2.31 (1.01)	223	229	0.003***
居住时长	5.90 (3.64)	5.42 (2.88)	223	229	0.274
收入	2.29 (0.84)	1.92 (0.75)	223	229	0.001***
生活满意度	7.07 (2.70)	6.53 (2.71)	223	229	0.136
压力大小	4.94 (3.18)	5.61 (3.21)	223	229	0.118
是否感到贫困	0.591 (0.49)	0.663 (0.47)	223	229	0.259
是否被公正对待	0.927 (0.261)	0.810 (0.393)	223	229	0.001***

注：表中\*，\*\*，\*\*\*分别表示在 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表中性别=1 表示男性，性别=0 表示女性。受教育程度为未受过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五档，分别对应 1~5。居住时常以年为单位。收入为家庭年收入，分为 1 万元以下、2~5 万元、5~10 万元、10~20 万元、20 万元以上五档，分别对应 1~5。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经济适用房住户和公租房在收入水平上存在差异 ( $p=0.001$ )，但是对贫困的感知并没有显著差异 ( $p=0.259$ )，在生活满意度 ( $p=0.136$ ) 和压力大小 ( $p=0.118$ ) 上也不存在显著差异。另外，两类被试群体在年龄 ( $p=0.079$ )、性别 ( $p=0.051$ )、受教育水平上 ( $p=0.003$ ) 存在一定的差异，我们会将之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加以控制。最后，我们还发现两类住户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被公平对待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 $p=0.001$ )，因此我们将其与收入水平、对贫困的感知、生活满意度和压力大小一起作为补充的解释变量加入回归模型中。

实验结果的总体数据显示 (详见图 1)，提议者中选择将初始禀赋的一半 (10 元) 分给对方的有 104 人，占提议者总人数的 46.02%；选择将初始禀赋的一半以上分配给对方的被试占提议者总人数的 21.23%。并且在提议者中还有 18 名被试选择将 20 元全部分给对方，占总人数的 7.96%。在响应者中要求公平分配 (两人各 10 元) 的被试人数有 95 人，占总人数的 42.04%；要求对方分配给自己多于一半的占总人数的 8.41%；要求对方将 20 元全部分配给自己的有 7 人，占总人数的 3.1%。

在总体上，所有分配者的平均提议额为 9.86 元 (方差为 4.59)，我们可以初步判断被试有较强的公平感，能将收益较为均等的在自己和博弈对象之间进行分配。

(二) 关于提议者分配决策的数据分析

在对被试的个体特征和实验结果进行整体上的统计性描述后，我们运用非参数检验 (Mann-Whitney U Test) 方法考察租购身份的公开、提议者租购身份、响应者租购身份对于最后通牒博弈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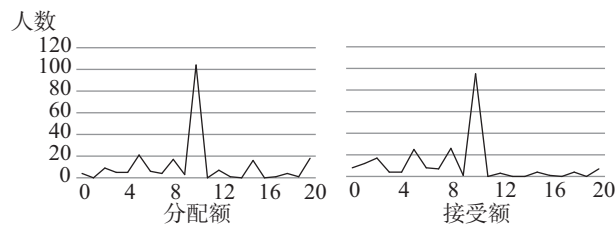


图 1 分配额和接受额总体分布情况



## 罗俊等：保障性住房、社会身份与公平感

提议者行为的影响，并检验两个相关假设。非参数检验结果显示：在未公开响应者租购身份的情况下，公租房提议者和经济适用房提议者的分配决策并不存在显著差异（C1 vs. C2:  $z = -1.045$ ;  $p = 0.290$ ）。

相比于不公开租购身份信息情况，不论是经济适用房提议者还是公租房提议者，在知晓响应者为公租房住户时都会提高他们的分配额（C1 vs. T3:  $z = 3.503$ ,  $p = 0.001$ ; C2 vs. T2:  $z = -2.975$ ,  $p = 0.003$ ）；而相比于不公开租购身份信息情况，不论是经济适用房提议者还是公租房提议者，在知

晓响应者为经济适用房住户时其分配决策均不会有显著的改变（C1 vs. T1:  $z = 0.216$ ,  $p = 0.829$ ; C2 vs. T4:  $z = -1.021$ ,  $p = 0.307$ ）。因此在验证假设 1 的四组检验结果中，有两组结果支持了假设 1，另外两组并不支持，假设 1 得到了部分支持。

相比于面对公租房响应者，经济适用房提议者在面对经济适用房响应者时，会显著降低分配额（T1 vs. T3:  $z = 3.266$ ,  $p = 0.001$ ）；而公租房提议者在面对公租房响应者和经济适用房响应者时，其分配额没有显著的差异（T2 vs. T4:  $z = -1.587$ ,  $p = 0.113$ ），因此假设 3 得到了部分支持。

表 3 提议者分配额的 Mann-Whitney 检验结果

假设	实验组	分配均值	非参数检验结果
基准组比较	C1 vs. C2	7.917 vs. 9.845	$z = -1.380$ ; $p = 0.168$
假设 1: 相比于不公开租购身份, 公开租购身份会显著改变提议者的分配额	C1 vs. T1	7.917 vs. 7.888	$z = 0.216$ ; $p = 0.829$
	C1 vs. T3	7.917 vs. 11.368	$z = -3.503$ ; $p = 0.001^{***}$
	C2 vs. T2	9.845 vs. 11.675	$z = -2.975$ ; $p = 0.003^{***}$
	C2 vs. T4	9.845 vs. 10.487	$z = -1.021$ ; $p = 0.307$
假设 3: 在公开租购身份的情况下, 提议者在面对不同租购身份的响应者时, 其分配额不同	T1 vs. T3	7.888 vs. 11.378	$z = -3.266$ ; $p = 0.001^{***}$
	T2 vs. T4	11.675 vs. 10.487	$z = -1.587$ ; $p = 0.113$

注：表中\*，\*\*，\*\*\*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经过各实验组分配额之间的非参数检验，我们得出了更准确的结论：相比于不公开租购身份信息，公开租购身份会显著的提高提议者（无论是经济适用房住户还是公租房住户）对公租房响应者的分配额；更进一步的检验表明，在公开租购身份的情况下，相比于面对经济适用房响应者，经济适用房提议者面对公租房响应者时，会显著提高分配额。为了更稳健地分析租购身份的公开、提议者的租购身份以及响应者的租购身份对最后通牒博弈中公平感的影响，我们结合非参数检验的结果，进一步构建了如下回归模型：

$$Offer_i = c + \beta_1 Pro_i + \beta_2 Pub_j + \beta_3 X_i + \epsilon_i \quad (1)$$

在该模型中，我们以最后通牒博弈中提议者  $i$  提议的分配额为被解释变量，在控制个体特征的情况下，以提议者租购身份和公开租购身份为解释变量。其中提议者租购身份和公开租购身份为虚拟变量： $Pro_i = 1$  表示提议者  $i$  为经济适用房住户， $Pro_i = 0$  表示提议者  $i$  为公租房住户； $Pub_j = 1$  表

示公开与提议者  $i$  匹配的响应者  $j$  的租购身份， $Pub_j = 0$  则表示不公开与提议者  $i$  匹配的响应者  $j$  的租购身份。 $X_i$  为该提议者  $i$  的个体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居住时长、收入、生活满意度、压力大小、是否感到贫困以及是否被公平对待。 $\epsilon$  为随机干扰项。

为了探究响应者租购身份对提议者分配决策的影响，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响应者租购身份和公开租购身份的交叉项  $Pub_j \times Res_j$  得到了模型（2）。其中  $Res_j = 1$  表示响应者  $j$  为经济适用房住户，而  $Res_j = 0$  则表示响应者  $j$  为公租房住户。为了考察公开租购身份对提议者自我身份的认知是否有影响，我们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提议者租购身份和公开租购身份的交叉项  $Pub_j \times Pro_i$  得到了模型（3）。在模型（3）的基础上，为考察提议者租购身份与响应者租购身份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我们又加入了公开租购身份、响应者租购身份和提议者租购身份的交叉项  $Pub_j \times Pro_i \times Res_j$  得到了模型（4）。表 5 中的数据为模

型 (1) - (4) 的 OLS 回归结果。

$$Offer_i = c + \beta_1 Pro_i + \beta_2 Pub_j + \beta_3 Pub_j \times Res_j + \beta_4 X_i + \epsilon_i \quad (2)$$

$$Offer_i = c + \beta_1 Pro_i + \beta_2 Pub_j + \beta_3 Pub_j \times Res_j$$

$$+ \beta_4 Pub_j \times Pro_i + \beta_5 X_i + \epsilon_i \quad (3)$$

$$Offer_i = c + \beta_1 Pro_i + \beta_2 Pub_j + \beta_3 Pub_j \times Res_j + \beta_4 Pub_j \times Pro_i + \beta_5 Pub_j \times Pro_i \times Res_j + \beta_6 X_i + \epsilon_i \quad (4)$$

表 4 提议者分配额的 OLS 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提议者的分配额			
	(1)	(2)	(3)	(4)
公开租购身份	1.515 (0.663)**	2.936 (0.755)***	3.044 (0.945)***	2.428 (0.996)**
提议者租购身份	-2.111 (0.613)***	-2.181 (0.597)***	-2.012 (1.072)*	-2.064 (1.064)*
公开×响应者租购身份	—	-2.516 (0.697)***	-2.513 (0.698)***	-1.328 (0.946)
公开×提议者租购身份	—	—	-0.248 (1.305)	1.033 (1.471)
公开×提议者租购身份× 响应者租购身份	—	—	—	-2.460 (1.338)*
年龄	0.021 (0.030)	0.010 (0.030)	0.010 (0.030)	0.014 (0.030)
性别	-0.482 (0.657)	-0.392 (0.639)	-0.389 (0.639)	-0.475 (0.636)
受教育程度	1.218 (0.332)***	1.195 (0.323)***	1.199 (0.324)***	1.212 (0.322)***
居住时长	0.054 (0.092)	0.098 (0.090)	0.091 (0.096)	0.094 (0.095)
收入	-0.175 (0.423)	-0.153 (0.412)	-0.148 (0.412)	-0.154 (0.409)
生活满意度	-0.017 (0.114)	-0.071 (0.112)	-0.070 (0.112)	-0.084 (0.112)
压力大小	0.129 (0.091)	0.088 (0.089)	0.090 (0.090)	0.085 (0.089)
是否感到贫困	-0.298 (0.659)	0.036 (0.648)	0.044 (0.649)	-0.068 (0.647)
是否被公正对待	1.019 (0.867)	1.266 (0.846)	1.264 (0.846)	1.278 (0.840)
常数项	4.343 (2.974)	4.826 (2.895)*	4.776 (2.907)	4.723 (2.885)
样本个数	226	226	226	226

注：表中\*，\*\*，\*\*\*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开租购身份会显著提高提议者的分配额。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适用房提议者相比较于公租房提议者其分配额更低。从表 5 的第 2 列和第 3 列中我们观察到，在公开租购身份的情况下，相比于面对公租房响应者，提议者在面对经济适用房响应者时分配额会显著的减少。我们还在表 5 第 4 列中观察到，在公开租购身份的情况下，当经济适用房提议者匹配到了经济适用房响应者时，相比其他情况，其分配额会显著减少。另外，我们还发现受教育水平在模型 (1) - (4) 中都显著地影响提议者的分配决策。

### (三) 关于响应者响应决策的数据分析

在对提议者的分配决策进行细致分析后，我们还需要考察博弈中响应者的响应决策是否也受到了租购身份的影响。表 6 是不同租购身份响应者在公开住户信息情况下与不公开住户信息情况下的平均接受额的非参数检验结果。在基准组的比较中我们观察到在不公开租购身份时，不同租购身份响应者公平感没有显著差异 (C1 vs. C2:  $z = -1.045$ ,  $p = 0.290$ )。但在公开租购身份后，经济适用房响应者的接受额有了显著的变化 (C1 vs. T1:  $z = 3.429$ ,  $p = 0.001$ )。因此在验证假设 2 的四组非参数检验中有一组结果支持假设 2，假设 2 得到了部分支持。

在公开租购身份的情况下，经济适用房响应者

罗俊等：保障性住房、社会身份与公平感

面对不同租购身份的提议者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公平感 (T1 vs. T4:  $z=1.969$ ,  $p=0.048$ ), 而公租房响应者在面对不同租购身份的提议者时则没有表现

出显著的差异 (T2 vs. T3:  $z=-0.520$ ,  $p=0.603$ ), 因此假设 4 得到了部分支持。

表 5 响应者接受额的 Mann-Whitney 检验结果

假设	实验组	接受额均值	非参数检验结果
基准组比较	C1 vs. C2	8.583 vs. 7.371	$z=-1.045$ ; $p=0.290$
假设 2: 相比于不公开租购身份, 公开租购身份会显著改变响应者的接受额。	C1 vs. T1	8.583 vs. 5.527	$z=3.429$ ; $p=0.001^{***}$
	C1 vs. T4	8.583 vs. 7.553	$z=1.574$ ; $p=0.115$
	C2 vs. T2	7.371 vs. 8.650	$z=-1.183$ ; $p=0.237$
	C2 vs. T3	7.371 vs. 9.463	$z=-1.631$ ; $p=0.102$
假设 4: 在公开租购身份的情况下, 响应者在面对不同租购身份的提议者时, 其接受额不同。	T1 vs. T4	8.583 vs. 7.553	$z=1.969$ ; $p=0.048^{**}$
	T2 vs. T3	8.650 vs. 9.463	$z=-0.520$ ; $p=0.603$

注: 表中\*, \*\*, \*\*\* 分别表示在 10%, 5%, 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在对各组响应者的接受额进行非参数检验后, 我们发现公开租购身份以及提议者的租购身份仅对经济适用房响应者的接受额产生了影响, 而对公租房响应者的接受额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为了更稳健地检验租购身份、公开租购身份信息对响应者公平感的影响, 我们构建了关于公开租购身份信息、响应者租购身份与响应者的接受额之间的回归模型:

$$Respond_j = c + \beta_1 Res_j + \beta_2 Pub_i + \beta_3 X_j + \epsilon_j \quad (5)$$

该模型中以响应者的接受额为被解释变量, 在

控制个体特征的情况下以响应者租购身份、公开租购身份为解释变量。其中, 响应者租购身份和公开租购身份为虚拟变量:  $Res_j=1$  表示响应者  $j$  为经济适用房住户,  $Res_j=0$  表示响应者  $j$  为公租房住户;  $Pub_i=1$  表示公开与响应者  $j$  匹配的提议者  $i$  的租购身份,  $Pub_i=0$  表示不公开与响应者  $j$  匹配的提议者  $i$  的租购身份。  $X_j$  为响应者的个体特征变量,  $\epsilon_j$  为随机干扰项。随后在该模型的基础上, 我们逐步加入了  $Pub_i \times Res_j$ 、 $Pub_i \times Pro_i$  以及  $Pub_i \times Res_j \times Pro_i$ , 构建了另外三个回归模型。表 7 为关于响应者接受额的 OLS 回归结果。

表 6 响应者接受额的 OLS 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响应者的接受额			
	(1)	(2)	(3)	(4)
公开租购身份	-0.134 (0.661)	0.211 (0.774)	2.130 (0.944)**	1.442 (0.993)
响应者租购身份	-1.391 (0.612)**	-1.408 (0.611)**	1.602 (1.071)	1.544 (1.061)
公开×提议者租购身份	—	-0.612 (0.714)	-0.545 (0.697)	0.778 (0.944)
公开×响应者租购身份	—	—	-4.412 (1.304)***	-2.981 (1.467)**
公开×提议者租购身份× 响应者租购身份	—	—	—	-2.746 (1.334)**
年龄	0.011 (0.030)	0.008 (0.030)	-0.001 (0.030)	0.003 (0.029)
性别	0.230 (0.655)	0.252 (0.655)	0.303 (0.639)	0.207 (0.635)
受教育程度	-0.024 (0.331)	-0.030 (0.331)	0.036 (0.324)	0.050 (0.321)
居住时长	-0.010 (0.092)	0.000 (0.092)	-0.112 (0.096)	-0.108 (0.095)
收入	-0.001 (0.422)	0.005 (0.422)	0.088 (0.412)	0.082 (0.408)
生活满意度	0.009 (0.114)	-0.004 (0.115)	0.017 (0.112)	0.001 (0.111)
压力大小	0.002 (0.091)	-0.008 (0.092)	0.025 (0.090)	0.020 (0.089)
是否感到贫困	0.355 (0.657)	0.436 (0.663)	0.571 (0.648)	0.447 (0.645)

续表

是否被公正对待	1.383 (0.865)	1.443 (0.866)*	1.410 (0.845)*	1.425 (0.837)
常数项	6.557 (2.966)**	6.675 (2.965)**	5.790 (2.904)**	5.730 (2.878)**
样本个数	226	226	226	226

注：表中\*，\*\*，\*\*\*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7中第1列、第2列和第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公开租购身份并不会显著地改变响应者的接受额。在表7第1列和第2列中，我们发现在控制其他条件相同时经济适用房响应者的接受额要比公租房响应者的接受额更低，但在第3列和第4列中只有在公开租购身份的情况下响应者身份对接受额才有显著的影响。

在第4列中我们观察到，在公开租购身份的情况下，控制其他条件相同，经济适用房响应者的接受额低于公租房相应者，并且若提议者也为经济适用房住户，则该接受额会进一步下降。以上回归结果表明，在公开租购身份的情况下，经济适用房响应者相比于公租房响应者更容易接受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并且如果提议者也为经济适用房住户，那么这种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接受程度会进一步上升。

#### (四) 租购身份对差异厌恶偏好的影响

在对分配者的分配额和响应者的接受额进行细致的分析后，我们试图从社会偏好角度寻找租购身份对个体公平感的影响路径。我们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得出的公平感，衡量的是被试对于分配结果公平的感知<sup>①</sup>，因此我们借鉴 Fehr and Schmidt (1999) 提出的“差异厌恶”模型，对被试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公平偏好进行测度。差异厌恶模型假设参与人在收益分配中只关注结果的公平与否。这表明参与人不仅关心个人的利益，还关注他人的收益，并且存在减少自身与他人收益差距的动机：当自身收益高于他人时，人们存在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他人，以减少双方的收益差距的动机；而当自身收益少于他人时，则存在减少他人收益，以缩小双方收益差距的动机。Bolton (1991)、Fehr and Schmidt (1999) 以及 Bolton and Ockenfels (2000) 等人均发展了差异厌恶模型，其中较为经

典的是 Fehr and Schmidt (1999) 构建的 F&S 模型。在该模型中，双人博弈的具体函数为：

$$U_i(x) = x_i - \alpha_i \max\{x_j - x_i, 0\} - \beta_i \max\{x_i - x_j, 0\}, i \neq j \quad (6)$$

其中  $\beta_i \leq \alpha_i$  且  $0 \leq \beta_i < 1$ 。 $\alpha_i$  被称为劣势不平等系数，衡量来自劣势不平等的效用损失， $\beta_i$  被称为优势不平等系数，衡量来自优势不平等的效用损失。公平感更强的个体会拥有更强的差异厌恶偏好，在资源分配中表现得更加公平。在我们的实验中，响应者在得知分配者的分配额前需要做出最低接受额  $y$  元的决策。借鉴 Blanco (2010) 测算劣势不平等系数的方法，我们认为对于响应者  $j$  而言得到  $y-1$  元所带来的效用小于得到 0 元所带来的效用，而得到  $y$  元所带来的效用大于得到 0 元所带来的效用。因此存在  $\tilde{y} \in (y-1, y)$ ，使得响应者得到  $\tilde{y}$  元的效用恰好等于得到 0 元的效用。若取  $\tilde{y} = y - 0.5$ ，并推算出劣势不平等系数  $\alpha_j = \frac{\tilde{y}}{20 - 2\tilde{y}}$ 。则可推算出：

$$\alpha_j = \frac{y - 0.5}{21 - 2y}, y \leq 10 \quad (7)$$

$$\beta_j = \frac{y - 0.5}{2y - 21}, y > 10 \quad (8)$$

按照传统理性人的假设，分配者会根据响应者  $\alpha_j$ 、 $\beta_j$  值以及自身效用函数做出最优决策，我们可以依次计算出  $\alpha_i$ 、 $\beta_i$  的值。但在现实中该假设过于强烈，分配者并不能准确的估计  $\alpha_j$ 、 $\beta_j$  值。因此我们放宽这一条件，以分配者与响应者收益差值  $\delta_i$  作为分配者差异厌恶的指标，从侧面衡量分

<sup>①</sup> 动机公平和结果公平是两种不同的公平观，在文中我们讨论的为结果公平，国内关于这两类公平的研究可参见陈叶烽等 (2011)。

## 罗俊等：保障性住房、社会身份与公平感

配者优势不平等厌恶水平和劣势不平等厌恶水平，则有：

$$\delta_i = \begin{cases} \delta_{1i} = 20 - 2x, x \leq 10 \\ \delta_{2i} = 2x - 20, x > 10 \end{cases} \quad (9)$$

其中  $\delta_{1i}$  衡量的是分配者的优势不平等厌恶， $\delta_{1i}$  越小则被试的优势不平等系数  $\beta_i$  越大； $\delta_{2i}$  衡量的是分配者的劣势不平等厌恶， $\delta_{2i}$  越小则被试的劣势不平等系数  $\alpha_i$  越大。下表为各实验局中被试  $\alpha_j$ 、 $\beta_j$ 、 $\delta_{1i}$  和  $\delta_{2i}$  平均值的分布情况。

表 7 各实验局被试的差异厌恶参数分布表

实验局	差异厌恶参数			
	$\delta_{1i}$	$\delta_{2i}$	$\alpha_j$	$\beta_j$
C1	5.22 (5.99)	1.33 (4.75)	5.32 (4.39)	2.20 (1.42)
C2	3.61 (5.32)	3.45 (7.54)	5.05 (4.68)	1.01 (0.75)
T1	6.83 (6.56)	3.52 (5.81)	2.65 (3.96)	0.40 (0.66)
T2	0.74 (2.15)	4.27 (6.78)	6.59 (4.18)	0.67 (0.78)
T3	2.58 (4.43)	5.53 (7.21)	6.07 (4.43)	0.98 (0.47)
T4	4.19 (6.18)	5.86 (8.81)	3.32 (3.97)	1.65 (1.75)

说明：括号内为标准差。T2 实验局中的  $\delta_{1i}$  数值与其他实验局相差较大，是由于该组中选择公平分配（各得一半）的被试较多。

为了更稳健地得出租购身份对个体公平偏好的

影响路径，我们以  $\delta_{1i}$ 、 $\delta_{2i}$ 、 $\alpha_i$  和  $\beta_i$  为被解释变量，以公开租购身份、分配者租购身份、响应者租购身份、三者的两两交互项以及三者的交互项为解释变量，在控制个体特征的情况下进行回归分析。

表 9 为提议者和响应者差异厌恶参数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公开租购身份的情况下，公租房响应者的劣势厌恶系数  $\alpha_j$  高于经济适用房响应者，表现出更强的公平感。但由于选择接受额大于 10 的被试样本过少，在优势厌恶系数  $\beta_j$  上我们并没有观察类似的结论。另一方面，在公开租购身份的情况下，相比于面对经济适用房响应者，提议者在面对公租房响应者时其  $\delta_{1i}$  与  $\delta_{2i}$  值均更高，表现出更强的公平感。

我们从差异厌恶偏好角度对租、购住户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博弈决策进行解读，发现公租房响应者的劣势不平等厌恶显著高于经济适用房响应者。在现实生活中，租房者相比购房者，其拥有更少或带有更多限制条件的公共服务权利，并且获取这些权利的准入条件也更为苛刻，因此他们会渴望得到更加公平的对待。这在我们的实验中体现为，当租房者作为资源接收者，他们表现出更强的公平感，希望得到更加公平的分配方案。

表 8 提议者和响应者差异厌恶参数的 OLS 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差异厌恶参数			
	$\alpha_j$	$\beta_j$	$\delta_{1i}$	$\delta_{2i}$
公开租购身份	1.748 (1.091)	0.062 (1.103)	-3.567 (1.420)**	-7.925 (3.831)**
提议者租购身份	—	—	2.696 (1.443)*	-7.653 (5.863)
响应者租购身份	0.755 (1.186)	2.039 (1.465)	—	—
公开 * 提议者租购身份	-0.438 (1.058)	0.454 (0.922)	-0.040 (2.120)	8.367 (6.539)
公开 * 响应者租购身份	-4.669 (1.636)***	-1.391 (1.942)	3.416 (1.400)**	6.440 (2.623)**
公开 * 提议者租购身份 * 响应者租购身份	0.050 (1.475)	-1.405 (1.248)	—	—
年龄	-0.014 (0.032)	0.028 (0.039)	0.012 (0.043)	-0.019 (0.103)
性别	-1.043 (0.719)	0.036 (0.752)	1.807 (0.930)*	1.854 (2.129)
受教育程度	0.201 (0.354)	0.125 (0.406)	-1.247 (0.456)***	0.205 (1.251)
居住时长	-0.063 (0.109)	-0.019 (0.078)	-0.120 (0.139)	0.514 (0.283)*
收入	0.402 (0.447)	-0.428 (0.592)	-0.212 (0.625)	-0.758 (1.171)
生活满意度	0.124 (0.123)	-0.080 (0.114)	0.245 (0.172)	0.650 (0.294)**

续表

压力大小	0.062 (0.098)	0.121 (0.114)	0.057 (0.129)	0.065 (0.286)
是否感到贫困	0.797 (0.700)	-0.283 (1.052)	0.785 (0.923)	-2.627 (2.099)
是否被公正对待	-0.105 (0.901)	1.049 (1.016)	-2.836 (1.211)**	1.079 (2.653)
常数项	3.322 (3.129)	-1.380 (3.571)	6.341 (4.185)	14.326 (10.632)
样本个数	199	27	178	48

注：表中\*，\*\*，\*\*\*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同时，我们也发现，租购权利的不同，使得人们从心理认知上将租房者和购房者区分为价值权重不同的两种身份，其中更为弱势的是租房者。因此在我们的实验中，资源分配者为了弥补日常生活中的不公平，其在面对的公租房住户时，会比面对经济适用房住户时更加公平。

## 五、结论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流动人口数量也逐年增长。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全国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数量超过4.9亿人，相比第六次人口普查增长近88.5%。对于日益增长的流动人口群体而言安居和乐业同等重要。尽管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流动人口的住房压力，但是由于资源配给不足（曾广录，2011）等原因，使得该政策无法保障租住公租房的住户和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住户在公共服务上享受同等的权利。这种权利的不平等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人们的认知，在人们心中形成了租购身份之间存在差异的认识。这种关于租购身份差异的认知对人们心理固有的公平感和经济行为决策可能会产生微观层面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否存在目前又缺乏相关的实证依据。

为此我们利用实地实验方法，在浙江省宁波市一处保障性住房社区开展了共计六场的社区实验，通过干预租购身份信息公开的情况，从自我认知和对他人的认知两个角度研究租购身份的差异对人们相互交往过程中公平感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租购身份及其带来的权利上的差异已经影响到了人们在相互交往时固有的公平感。在公开租购身份时，提议者会给予公租房响应者更加公平的分配方案；在公开租购身份时，公租房响应者比经济适用房响应者更加希望得到公平的分配方案。

通过构建差异厌恶偏好参数，我们尝试从社会偏好的角度寻找租购身份对个体公平感的影响路径。我们观察到在公开租购身份的情况下，当作为响应者时，公租房住户的劣势不平等厌恶强于经济适用房住户，从而表现出更强的公平感，要求更平等的分配方案；相比于面对经济适用房响应者，人们在面对公租房响应者时，其优势不平等厌恶和劣势不平等厌恶均会增强，从而表现出更强的公平感，提出更公平的分配方案。

我们的实验结果显示租购权利不同使得租购住户之间形成了社会身份上的差异。这种社会身份与其他社会身份类似，对人们的行为决策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人们对分配结果的公平感，从而可能在中低收入人群中产生社会分割。具体而言在当前的公共服务体制下，租房者与购房者之间由于基本教育、基本养老、基本政府服务等权利上仍有较大差异，这些权利的准入条件也对租房者更为苛刻。长此以往，这种不同待遇在认知层面上影响了人们的公平感。而这种影响是多个方面的：一方面，当租购身份被公开揭示时，租购身份会唤起租房者关于过往不平等基本公共权利的经历，使得租房者在资源分配中渴望得到更加公平的权重；另一方面，租购身份的公开揭示也会强化资源分配者对当前社会存在的租购权利不平等现象的认识，从而在资源分配时给予租房者更公平的权重。

本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科学的尝试：其一，我们检验了购房者和租房者这类租购身份的引入，对于被试公平感的影响，拓宽了在国内社会环境中研究不同社会身份群体之间亲社会行为差异的思路。其二，我们尝试采用实地实验方法，将实验场地从大学实验室转移到了社区中，试图在更加真实的环境下有效地检验现实政策导致的社会问题。

## 罗俊等：保障性住房、社会身份与公平感

其三，实验的被试为低收入人群、夹心层人群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行为表现，可以丰富国内实验经济学研究的样本数据库。

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能为租购同权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若能完善长租房政策，使得租房者享受到与购房者相同的权利，则能进一步加快社会融合，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但是受制于现实因素，我们没能选择更多的地区进行实验，也没能得出更广泛的结论。希望后续

能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对保障房住户的其他亲社会行为（如利他、合作、信任等）进行考察，还可以从入住保障房前后住户亲社会行为的变化来考察租购身份对人们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此外，我们的被试仅仅是保障房社区中的住户，若是要分析住房政策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未来的研究还可以邀请其他社会阶层中的租房者与购房者参与我们的实验。最后，相关的研究表明，社会身份的差异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可能要比对成年人的影响更大（McKown, 2003; Sutter, 2007），补充住房政策对中低收入家庭中未成年人影响的研究也有一定意义。

### 参考文献

- 陈超、柳子君、肖辉，2011：《从供给视角看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两难困境”》，《金融研究》第1期。
- 陈叶烽、周业安、宋紫峰，2011：《人们关注的是分配动机还是分配结果？——最后通牒实验视角下两种公平观的考察》，《经济研究》第6期。
- 邓红平、罗俊，2016：《不完全信息下公共租赁住房匹配机制——基于偏好表达策略的实验研究》，《经济研究》第10期。
- 黄友琴、易成栋，2009：《户口、迁移与居住分异——以武汉为例的实证研究》，《城市发展研究》第16期。
- 李勇辉、李小琴、沈波澜，2019：《安居才能团聚？——保障性住房对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推动效应研究》，《财经研究》第12期。
- 曾广录，2011：《保障性住房私人融资的不足性及弥补对策》，《当代财经》第8期。
- 周素红、程璐萍、吴志东，2010：《广州市保障性住房社区居民的居住——就业选择与空间匹配性》，《地理研究》第10期。
- Afridi, F., L. Sherry, X. L., & Ren, Y. F., 2015, "Social Identity and Inequality: The Impact of China's Hukou Syste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23: 17 - 29.
- Akerlof, G. A., & Rachel, E. K., 2000, "Economics and Identit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 715 - 753.
- Bargh, J. A., 2006, "What Have We Been Priming All These Years? On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s, and Ecology of Nonconscious Social Behavior",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6 (2): 147 - 168.
- Benjamin, D. J., Choi, J. J., & Fisher, G., 2016, "Religious Identity and Economic Behavior",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8 (4): 617 - 637.
- Benjamin, D. J., James, J. C., & Strickland, A. J., 2010, "Social Identity and Preferen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 (4): 1913 - 1928.
- Berge, L., Bjorvatn, K., Galle, S., Miguel, E., Posner, D., & Tungodden, B., 2015, "How Strong Are Ethnic Preference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in Economics*.
- Bernhard, H., E. Fehr, & U. Fischbacher., 2006, "Group Affiliation and Altruistic Norm Enforce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 (2): 217 - 221.
- Blanco, M., Engelmann, D. & Normann, H. T., 2011, "A Within-subject Analysis of Other-regarding Preference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72 (2): 321 - 338.
- Bolton, G., E., 1991, "A Comparative Model of Bargaining: Theory and Evi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6 - 1136.

- Bolton, G. , E. , & Ockenfels, A. , 2000, “ERC: A Theory of Equity, Reciprocity, and Compet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 (1): 166 – 193.
- Brandts, J. , & Charness, G. , 2011, “The Strategy versus the Direct-response Method: A First Survey of Experimental Comparisons”, *Experimental Economics*, 14 (3), 375 – 398.
- Chang, D. , Chen, R. , & Krupka, E. , 2014, “Social Norms and Identity Driven Choice (Tech. Rep)”,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Charness, G. , Rigotti, L. , & Rustichini, A. , 2007,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Group Membershi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4): 1340 – 1352.
- Chen Y. , & Li, X. , 2009, “Group Identity and Social Preferen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 (1):431 – 457.
- Chetty, R. , Hendren, N. , Jones, M.R. , & Porter, S.R. , 2020, “Race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 (2): 711 – 783.
- Cohn, A. , Fehr, E. , & Marechall, M. , A. , 2014, “Business Culture and Dishonesty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Nature*, 516 (7529): 86 – 89.
- Cohn, A. , MA Maréchal, & Noll, T. , 2015, “Bad Boys: How Criminal Identity Salience Affects Rule Viola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2 (4): 1289 – 1308.
- Cutler D M, Glaeser E L. , 1997, “Are Ghettos Good or Bad?”,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 (3): 827 – 872.
- Fehr E. , & Schmidt K. , 1999, “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 817 – 868.
- Fershtman, C. , & Gneezy, U. , 2001, “Discrimination in A Segmented Society: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 351 – 377.
- Gautam, G. , Minhaj, M. , Pushkar, M. , Santanu, M. , & Ananta Neelim. , 2018, “Religion, Minority Status and Trust: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46: 180 – 205
- Güth, W. , Schmittberger, R. , & Schwarze, B. , 1982,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Ultimatum Bargaini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3 (4): 367 – 388.
- Henrich, J. , 2000, “Does Culture Matter in Economic Behavior? Ultimatum Game Bargaining among the Machiguenga of the Peruvian Amaz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 (4): 973 – 979.
- Hoff, K. , & Pandey, P. , 2006, “Discrimination, Social Identity, and Durable Inequali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96 (2): 206 – 211.
- Jiang, J. , & Li, S.X. , 2019, “Group Identity and Partnership”,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60: 202 – 213.
- Luo, J. , Chen, Y. , He, H. , & Gao, G. , 2019, “Hukou Identity and Fairness in the Ultimatum Game”, *Theory and Decision*, 87 (3): 389 – 420.
- McKown, C. , & Weinstein, R. S. , 2003,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equences of Stereotype Consciousness in Middle Childhood”, *Child Development*, 74 (2): 498 – 515.
- Mcleish, K.N. , & Oxoby, R.J. , 2011,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the Salience of Social Ident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2 (1): 172 – 178.
- Oosterbeek, H. , R. Sloof, & G. Kuilen. , 2004,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Ultimatum Game Experiments: Evidence from A Meta-Analysis”, *Experimental Economics*, 7: 171 – 188.
- Shariff, A.F. , & Norenzayan, A. , 2007, “God is Watching You: Priming God Concepts Increases Prosocial Behavior in An Anonymous Economic Gam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 (9): 803 – 809.
- Shih, M. , Pittinsky, T.L. , & Ambady, N. , 1999, “Stereotype Susceptibility: Identity Salience and Shifts in Quantitative Performa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 (1): 80 – 83.
- Smith, A. , 2011, “Identifying in-group and out-group effects in the trust gam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and*



## 罗俊等：保障性住房、社会身份与公平感

*Policy*, 11 (1) .

Solnick, S. , 2001,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Ultimatum Game”, *Economic Inquiry*, 39 (2): 189 – 200.

Sutter, M. , & Kocher, M. G. , 2007,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across Different Age Group”,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59 (2): 364 – 382.

Tajfel, H. , 1974,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Behaviour”,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3 (2): 65 – 93.

Tajfel, H. , & Turner, J. C. , 1986,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Chicago: Nelson-Hall.

Zizzo, D. J. , 2010, “Experimenter Demand Effects in Economic Experiments”, *Experimental Economics*, 13 (1): 75 – 98.

## **INDEMNIFICATORY HOUSING, SOCIAL IDENTITY AND FAIRNESS:**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Community

LUO Jun<sup>1</sup> HUANG Jiaqi<sup>1</sup> LIU Jingshan<sup>1</sup> SHI Ronghao<sup>1</sup>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enter for Economic Behavior and Decision-maki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In 2020, The Central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pointed out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demnificatory housing. At the same time, it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renting and purchase should gradually have the same right to enjoy public services. The long-term inequality right between tenant and buyer makes people view different between renting houses and buying houses in psychological cognition, which may further lead to difference in social identity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whether the difference of tenant and buyer identity will affect people’s sense of fairness in daily communication, which can improve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s and promo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with avoiding social segmentation between tenants and buyers.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interference of other factors, we use the method of field experiment with affordable housing and public rental housing households as subjects, taking the disclosure of tenant and buyer identity information as the intervention and introducing the tenant and buyer identity exogenous into the ultimatum game for the purpose of investigating whether tenant and buyer identity affects fairnes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sclosing tenant and buyer identity will awaken the self-awareness of tenants. The long-term inequality of tenants’ and buyers’ right makes tenants eager for a more equitabl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t the same time, disclosing tenant and buyer identity will also change people’s cognition of others. Compared with facing property buyers, people will put forward a mor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plan when facing tenants.

**Key words:** indemnificatory housing; equal right between buyer and tenant; social identity; ultimatum game; field experiment.